



『延安文艺』带给我们的启示

□ 郝戎

（一）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80年前的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阐述了党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

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畏艰难险阻，敢于且善于夺取胜利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延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生活的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写照。抗战期间大批进步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在延安中央礼堂，由上海等地来的救亡演剧队、流动宣传队与延安当地的戏剧骨干联合演出了沙可夫执笔的多幕话剧《血祭上海》。毛泽东认为这个戏很好，团结了延安和上海等地的文化力量，建议这个队伍不要散了。有人提出，应该以这些人为基础成立一个艺术学院，毛泽东说愿以最大力量帮助学院的成立。1938年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林伯渠等7人联名签署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培养党的文艺干部的综合性艺术院校。鲁艺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发表演讲时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条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这段话道出了艺术教育的朴素真理，对于当今的文艺创作而言同样具

有指导意义。鲁迅艺术学院最初只设有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与扶助下，鲁艺迅速壮大。后又增加了文学系。1940年，鲁艺开始制定新的教学计划，课堂讲授古今中外名家经典，课外演大戏排名著。周立波在鲁艺教授“名著选读”，讲司马迁、巴尔扎克、梅里美、莫泊桑、普希金、托尔斯泰、法捷耶夫的作品，还和茅盾同时讲《红楼梦》。戏剧系主任张庚带着师生排演果戈理、契诃夫、曹禺的名剧……但看似繁荣的表象下，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是“关门提高”，关起门来搞艺术。延安的群众对这些远离他们生活的名著根本不明所以，那时的鲁艺在创作实践上逐渐脱离了抗战的现实。用当年的鲁艺人，后进入中戏表演班学习并留校的于蓝老师的话说就是“观众不赏识，英雄无用武之地”。胡乔木认为鲁艺突出的问题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提高是对的，但不能关门。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在鲁迅艺术学院身上暴露得极为明显，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现实中也依然存在。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的文艺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他们满怀革命和救国热情，但对如何掌握革命文化的武器为抗战和人民群众服务，如何与工农兵结合正确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不是很清楚。而且当时延安很多文艺界人士并不注重体验生活，去采风就是揣着兜去旁边看群众开会，根本不能也不可能了解群众的生活和情感。周立波本人说：整整的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里去过一回。作家严文井说：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爱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涉及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高屋建瓴、深入浅出。问题的中心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后，毛泽东到鲁艺作报告。他说：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创作的大趋势开始走向人民大众，走向民间。

1943年春节，延安掀起了新秧歌运动，新秧歌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在《讲话》的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是鲁艺工作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努力



秧歌剧《兄妹开荒》

（二）

的成果。鲁艺的秧歌剧反映了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新生活，被群众亲切地称之为“鲁艺家”，队伍演到哪里，群众跟到哪里。这和“关门提高”“洋教条”期间的鲁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东方红》曲调源自民间，由马可等人记录下来，重新编曲填词，成为推陈出新的佳作。

从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到《白毛女》这个集合全院力量创作的新歌剧，都是毛泽东提倡的雪中送炭的艺术。农民看了《白毛女》，投身到批斗恶霸的土改热潮中；战士看了《白毛女》，高喊着“为喜儿报仇”，杀敌立功。鲁艺文工团演员、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说《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支援了战争、支援了土改。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走向了新的道路，以鲁艺为代表的艺术家们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错纠偏，造就了延安的文艺繁荣。鲁迅艺术学院的成就，是跟延安文艺座谈会分不开的，是跟鲁艺师生践行《讲话》精神分不开的。鲁艺师生在《讲话》精神鼓舞下，走出“小鲁艺”，迈向“大鲁艺”，坚持扎根人民，到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学习和创作，为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翻身解放服务，推出了一大批反映边区军民风貌、具有民间艺术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正是因为以人民为创作主角，以生活为创作源泉，鲁艺的文艺作品才会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这对当下我们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深刻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性这一深刻内涵。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态度怎么样，同时也决定着人民是否接受他们创作的作品。只有人民接受了，文艺作品才能更好地普及；只有倾听了人民的呼声，人民接受了、深入人民了、打动了民心了，文艺作品才能不断地提高。

在针对“文艺工作对象的人民性”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只有把自己思想情感和群众融合，深入群众生活，熟悉群众、了解群众，才能创作出深受人民喜欢的文艺作品。对文艺批评的标准同样体现人民性。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讲话中同样将“人民性”提高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所谓人民的文艺，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它表现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及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没有人民，社会主义文艺就失去了灵魂；没有人民，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就失去根本遵循。这不仅是当代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和艺术教育者传承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根本遵循。要改变我国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回到80年前的延安去寻找答案。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

大学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梅花书院：“与时俱进”一词出自山长

□ 武 星

明清时“扬州繁华以盐盛”，盐官、盐商借其财富资助教育，促进了扬州书院的迅速发展，曾出现“东南书院之盛，扬州得其三”的盛况，在中国书院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梅花书院是“扬州得其三”中现今唯一尚存遗址的书院，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因是国内唯一专课举人的书院而闻名。

入礼门、树仁心、走义路

梅花书院的起源与明代心学家湛若水有直接的关联。明嘉靖六年（1527年），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一职的湛若水在赴京考绩时路过扬州讲学，扬州贡生葛洞、葛洞兄弟为求学受教，在甘泉山下为其建起行窝，作休憩、讲道之所。因湛若水号甘泉，行窝恰巧又建在了甘泉山下，于是将此居所命名为甘泉行窝。此后不久，巡盐御史朱廷立将行窝改名为甘泉山书院。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扬州知府吴秀开浚城壕，用掘出的淤泥在空地上堆成了一座土岭，在岭上遍植梅树而成梅岭，并在岭上建楼台池榭，称为“平山别墅”，以作在扬州停留的州县官吏休憩之所。后来，巡按御史牛应元来到扬州时，将这里改为崇雅书院。

清康熙南巡时曾赐“经术造士”御匾给扬州安定书院，此举极大激发了扬州盐官、盐商办书院的积极性。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扬州府同知刘重选与大盐商马曰琯于崇雅书院旧址——梅花岭建起了梅花书院。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马曰琯的儿子马振伯主动提出将梅花书院的房产与地产全部捐献出来，当时的盐运使朱孝纯接受了呈请。梅花书院因此“由民

转公”。朱孝纯随后重新修缮了书院楼宇，并聘请桐城派领袖姚鼐出任梅花书院山长（掌院），梅花书院由此进入了“盐官兴学、盐商助学”的鼎盛时期。

朱孝纯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辞官北上归京，姚鼐也辞去梅花书院山长一职，离开扬州。此后，盐运使曾燠、盐政额勒布、阿克当阿先后接管梅花书院。清咸丰年间，梅花书院毁于战火。同治五年（1866年），盐运使丁日昌在东关街重建书院，由书画名家吴让之书写“梅花书院”雕成石额。两年后，该处让位于安定书院，梅花书院迁至左卫街（即今天的广陵路）官房，即今址。

光绪末年（1908年），梅花书院开始了向现代教育的转变。历经沧桑的梅花书院，唯其不变的是“入礼门、树仁心、走义路”九字教育理念。

“与时俱进”的来历

姚鼐是梅花书院发展步入正轨后首任山长，同时梅花书院也是姚鼐从事书院教育事业的起步之所。姚鼐任梅花书院山长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这段时间对梅花书院的发展影响巨大，在姚鼐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独特地位。



主持梅花书院的第二年，姚鼐在为老师贺寿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提出：“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正是在此期间，姚鼐系统思考了“桐城派”这一范畴，也明确了自己在文章之学方面和方苞、刘大槐的传承关系。由此开始，“桐城三祖”的名号呼之欲出。

姚鼐任梅花书院山长期间，大力提倡古文，为穷尽古今文体发展变化

之法则，编纂了《古文辞类纂》一书。该书《序目》记载：“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说明促使姚鼐编纂此书直接起因就是回答梅花书院弟子学文过程中的疑问。姚鼐在随后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无一日不教此书，无一日不修此书”，此书也成为姚门数百弟子为文的范本，而这一范本的编纂正是起源于梅花书院。

据考证，“与时俱进”一词最早也出自梅花书院山长姚鼐。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扬州知府谢启昆久慕姚鼐的才学，将自己所写的诗文编成诗

集，请姚鼐为其写序。姚鼐在《谢蘊山诗集序》中写道：“十余年来先生之所造，与时俱进”，意指谢启昆敢于创新、勇于摒弃的文风。而回顾梅花书院的办学历史，也可谓是“与时俱进”，秉持创新精神，形成了诸多办学特色。

制定不同等级奖学金

坚持“官课”和“院课”相结合。“官课”由地方官吏到书院授课、考评，如朱孝纯管理书院时每月都会抽出一天的时间到书院给学生上上课。扬州府同知刘重远，两淮盐运使朱续焯，扬州知府蒋嘉年、高士钥，江都县令朱辉，甘泉县令龚鉴等都曾来书院授课。“院课”则由书院山长讲授。梅花书院的山长从姚鼐始自蒋宗海止共五任，皆是进士出身、知名学者，时有“海内文士，丰集维扬”之说。

设置“等级奖学金”。朱孝纯管理梅花书院时，为了鼓励学生们刻苦上进，制定了不同等级的奖学金。“一岁中取三次优等者升，取三次劣等者降”“第一等第一名给优奖银一两，二、三名给优奖银八钱，以下六钱”。后奖学金额度又不断提高。

“师资交流”机制。由于扬州书院

统一由盐衙管理，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梅花书院与安定书院互聘学师，使人才得以交流，思想得到碰撞，是书院管理制度的一大创新。

附设“孝廉堂”，专课举人。所谓“专课举人”，是指举人们进京赶考前，在梅花书院的“孝廉堂”集中培训，邀请名师指点，学子相互切磋感悟。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盐运使阿克当阿把举人集中到梅花书院，组织名师为他们进行考前辅导点拨，其他郡县的应试者听闻消息，也纷纷前来旁听，100多人济济一堂。阿克当阿为这些学子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还资助他们赴京赶考。考试结果令阿克当阿喜出望外：梅花书院学子洪莹喜中状元。

梅花书院在明清时期先后出过4名状元，包括兴化人李春芳、宝应人王式丹、仪征人陈俨等。在办学兴盛时期，吸引了众多优秀学子从各地前来求学。

历经近500年的风雨沧桑，今天的梅花书院被修缮为扬州书院博物馆，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创办于1906年的广陵小学，承袭梅花书院办学传统，将梅花书院流传下来的“入礼门、树仁心”思想作为校训。“孔孟道，民族魂；树仁心，入礼门；古书院，传统承；立校训，育新人。”梅花书院的办学精神在学生的声声吟诵中得到传承。

